

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类教材编写出版的特点与启示*

◎尹洁 黄刚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中央和地方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多套识字类教材。这些教材既体现了时代性、政治性等特征，又考虑到学习者认知心理和科学识字方法等因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材料，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识字类教材编写和出版仍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识字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 扫盲运动 时代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约有8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其中农工子弟又占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整体文化基础较差，严重制约着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开展识字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就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分别于1952、1956、1958年开展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扫盲运动，编写了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层次各类识字教材，大力推行识字教育，逐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识字水平和识字能力。识字课本作为识字教学必需的书面文字凭借材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教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当代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教材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国家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多套识字教材。这些教材，在性质上，有的是专门的扫盲识字课本，有的是兼有语文教育性质的识字课本。在层次上，既有国家级出版社编写的全国通用识字课本，也有各级行政机构组织编写的、面向当地的识字教材。这些教材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识字教育的基本理念。

1. 展现时代特征与满足实际需求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这17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共出版识字类教材近30版，若以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有

20余版，后一阶段不超过5版。课本内容涉及多方面，包括赞歌颂歌类、政策路线类、时事政治类、思想意识类、人物故事类、行为习惯类、国情教育类、科学知识类、日常应用文和寓言故事等。这些主题及内容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对新政权的歌颂和对新生活的热情。

这些教材的使用对象是大量的不识字或少识字的工农群众和干部职工，因此在编写教材时又根据使用对象的不同，区分出针对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妇女等不同群体的专用课本，如《农民识字课本》《职工识字课本》《机关职工业余学校国语课本》《妇女文化课本》。在总体框架下，不同的使用对象的课本又有所不同。

从内容上看，面向农民的识字课本较多选择与农村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如农业生产活动（耕种、畜牧、农田水利），农村常用计量单位（石、斗、升），农业机械仪器（拖拉机、新农具），农村常用应用文（借条、请假条、通知、介绍信），农业相关政策（互助组、供销社），生产生活常识（有病请医生、治蚜虫），科普知识（雷电、日食月食）等。

面向干部职工的课本会较多选择与机关、厂矿和城市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角色认同（歌颂工人阶级、工农团结、师徒关系），工业机械仪器（机床、螺丝），规章与习惯（遵守制度、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储蓄），国家建设（烧煤烧砖、炼钢、修铁路、机械化），国家政策（发展重工业、买公债、遵守宪法），科普知识（空气、水、病菌）、国外工人故事（苏联、朝鲜、越南），

*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常用应用文(介绍信、挑战书与应战书)等。面向妇女的课本多会选择与妇女生产生活相关的内容,如角色认同(妇女地位、妇女节日、妇女集体、妇女团结),家庭观念(婚姻自主、婚姻法、英雄母亲、好家庭)、妇女生活(怀孕、月经、托儿站、儿童教育),生活常识(传染、预防针、买东西、保护牙齿),常用应用文(书信、便条、请假条)等。

从识字量的要求来看,不同群体的标准又有所区别。在扫盲之初,国家未出台相应的识字标准,教材编写者对识字量的要求也不明确,如《职工业余学校国语课本(普通班适用)》第一册生字340个,平均每字重复20次以上。随着扫盲运动的开展,国家制定的识字标准也相应发生变化。1953年规定干部和工人认识2000个常用字,农民认识1000个常用字,城市劳动人民认识1500个常用字。1956年新的扫盲标准为:工人识字2000个左右;农民识字1500个。课本的编写大致照章进行。如《农民识字课本》(1951)、《农民速成识字教材》(1952)编入1500左右的常用字,《职工识字课本》(1954)、《干部职工识字课本》(1956)包括2000多常用字。到1960年代,识字量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民业余初等学校课本·语文》(1963)要求识字2700个左右,《职工业余初等学校课本·语文(试用本)》(1965)识字量达到2500个以上。总体上说,对干部职工的要求高于对农民的要求。

可见,在体现时代特征和风貌与结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方面,17年来的识字教材具有典范性。

2.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继承传统相结合

这一时期的课本编写也基本贯彻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例如,《农民业余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1956)在编写说明中指出,通过识字教育,“对学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他们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农民识字课本》(1955)认为,“除了进行识字教育以外,还要通过课文的教学,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加普通科学知识”。《职工识字课本》(1954)第一册共有课文30篇,其中,歌颂类6篇、国情时政类7篇、鼓励学习生产的11篇、培养良好习惯的3篇、识字知识教育3篇。总体来看,这17年的识字教材中,带有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篇目一般都超过50%。寓识字和语文教育于政治教育是这一

阶段教材的特色。

除了强调政治性,这一时期的识字课本也沿袭了不少以前的识字课本的特征。在内容上,有一些直接来自民国时期识字教材(包括国统区和解放区教材),这主要表现为基础字的教学和解放区教材中一些歌颂党、领袖和解放军的内容。在文体上,不少课本继承了我国识字教材以韵文为主的传统,将零散、孤立的字词变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包括诗歌、歌谣、格言、谚语等。这种形式既可激发学员的兴趣、利于记诵,又能在语境中理解字词的意义和用法,巩固识字效果,也为后期的写作和阅读教学打下基础。

3. 关注学习心理与强调分类集中相结合

学习心理包括学习者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想象、情感、意志、性格等。编写教材时应分析学习者的气质、性格、能力等方面的特点,并结合他们的学习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倾向,由此选择教材内容、编排识字顺序。我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人识字教材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根据感知觉、思维、想象的发展,从总体识字规律出发,由“音”到“形”到“义”到“用”,讲求“认读优先、写用随后”。第二种是从学习者的情感认同度最高、与生活最密切的内容(如身份、现状)出发进行教学。第三种是从学习者思想意识的接受度最高,与理想、信念、世界观最为密切的教育目标出发选取内容,不考虑汉字的难易程度。

这三种倾向各有利弊。第一种最符合识字规律,注意到汉字的形音义用四个要素,但没有语言环境就可能使识字变得单调枯燥。第二种从学习者的生活现状出发,生动活泼,容易产生兴趣,便于理解。第三种与当时的教育目标联系最紧密,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步,节省了教育成本。这三类识字教材的共性是都关注到了汉字的使用频度,但都不太关注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第三类因有前期的准备课,学员已掌握有一定数量的基础汉字,对课文中的汉字尚可接受。而第一、二类识字教育可能因字形复杂(尤其1957年以前的课本均为繁体字)引发学习者的畏难情绪,识字效果不佳。

4. 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结合

通常认为,识字是读书、作文的基础。因此在传统识字教育中,使用最多的是集中识字,无论是“三千”等童蒙识字教材,还是民间的各种杂字课本,都是

将需要认识的一批字集中起来进行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集中识字主要使用在成人识字课本中。

随文识字是在语言环境中识字，也就是在学习课文的同时，认识其中的生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随文识字的优点在于，既有灵活生动的课文内容，又可通过复现以强调基础字和高频字，有助于巩固已学汉字，注重实用性。

将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结合得比较好的是《职工业余学校国语课本（普通班适用）》（1952），它贯彻了“语文一致”的原则。在15课前注重字的笔法笔顺，30课前注重汉字的偏旁部首，以帮助学员迅速理解字的结构，知道写的规律；从20课到44课除了上述要求外，还通过标点符号进行语法、语气的练习，使学员初步体会说写一致的道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教材对 现今识字教材编写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间，我国出版了大量内容形式各异的识字教材，回顾和总结尚处于草创阶段的识字类教材的特点，对今后编写类似教材具有重要启示。

1. 趣味性与渐进性的统一

语言和文字具有非同质性，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人们先学会语言后学习文字。因此，编写识字教材就应充分认识到认知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机制，从学习者容易接触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出发，找寻符合学习者的思维特点、能够激发兴趣、开掘学习者认知潜力的内容。同时，初学者期望获得流畅的阅读，编写教材时尽可能减少“挫伤阅读主动性”的障碍，注重课本认读内容的生动性和连贯性，并且注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学习。17年中的识字教材中的字词句大多结合了学习者的生活场景，由此选词行文，为识字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学习文本。

2. 稳定性与时代性的融通

汉字中的基础字自古沿用至今，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识字教材中都不可回避和取代，在编写识字教材时就要保证这批字的稳定性。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它虽没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但它所记录的语言却是表现时代特征和风貌的有效工具。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教材中出现的“东方红，太阳升”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是现阶段小学语文识字课本中出现的“我们成功了”展现

北京申奥成功场景，都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因此，识字教材在选字、组词、造句、成文时都需注意到基础汉字的稳定性和识字内容的时代性，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

3. 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类教材“融思想政治教育于识字教育之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分科不细、师资力量不足等现实矛盾，在传播新思想、树立新观念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为从识字教育本身的逻辑来看，识字仅仅是学习知识文化的基础，它的工具性的特征应大于其思想性和政治性。在当今这个分科愈加精细的时代，应充分厘清各学科间的界限，处理好识字教材的工具性和思想性、政治性之间的关系。

4. 认写分流，先认后写

从学习心理学来看，认和读是信息输入的过程，说和写是信息输出的过程。对于儿童识字教材来说，因儿童的思维较少具有逻辑性，偏向输入直接的信息和输出碎片化信息，故宜采用“随文识字”的办法，从生动的语言中先认读汉字再学习书写。书写的要求可以是零散、单个的汉字，从基本笔画、笔顺学起，逐步了解和掌握汉字书写规则和结构原则，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对于成人识字教材来说，若针对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可以在集中识字的基础上编写相应的随文识字教材。若针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因其不具备汉语语言基础，宜采用“多认少写、先认后写”的识字方式，编写随文识字教材。对上述三类情况，都可以配以专门的“写字教材”，为学生准确、快速、美观地书写汉字打下基础。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青壮年中的文盲或半文盲数量已大大降低，专门针对母语为汉语的成人识字教材也较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类教材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其中的一些经验也为今天编写儿童识字和外国人学习汉字的教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方成智. 建国初期识字课本分析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 (3).
-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育学部;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